

文庫博物館專集（三十五）

不少文章都提到过这付对联产生的时代背景，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当对联传入我所在的大学后，那些靠“根正苗红”，在政治运动中整人起家的学生如同获得

了掌管生杀大权的尚方宝剑，立刻变的骄横不可一世，恨不得把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全都踩在脚底下，校园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有必要把我所在的大学简单介绍一下。这所大学隶属国防科委，专门为国防军工系统输送技术人材，政治条件和家庭出身是录取的首选条件，学生中，农村来的贫下中农子女占了绝大多数，其次是各级“革干”“革军”子女，包括中央领导人的孩子，以及工人后代。只有极少数学生和我一样，来自知识份子家庭。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知识份子概念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由于建国才十七年，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份子子女还没到上大学的年龄，除了少数投奔延安的知识份子成为革命干部外，凡是民国年间有过工作的，就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属于利用改造对象，其子女当然要入“另册”。由于地富反坏右和剥削阶级的子女根本没资格进入这所大学，来自知识份子家庭的学生，就成了“红五类”打击专政的对象。然而，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我能进入这所密级甚高的学院，是因为录取分数高，招不到足够的贫下中农子女，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文化革命批判院党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把阶级异己份子安插进国防尖端技术部门。有一种说法是，招收极少数出身不好的学生是为了提供活的阶级斗争反面教材，如同样板戏中都要有阶级敌人一样。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已无从考证，但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是完全有可能的。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我被打成反革命接受批斗，从批斗我的揭发的材料来看，从进校第一天起，我的“反动”言行就已一一记录在案了。

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运动初期纠出来的走资派成为“死狗”。为了“立新功”，革命左派就须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作为新的批斗对象。知识份子虽然被列入“另册”，但还不属于“黑五类”阶级敌人。但是，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和经验，定阶级成份要查三代，查查知识份子在原籍农村的成份，一多半就可以划成阶级敌人作为批判靶子了。好在不少文革左派本人就是土改积极份子，或者是他们的后代，轻车熟路，费不了多大劲就挖出了大批“阶级敌人”。

在中国，出身和籍贯几乎是所有表格都必须填写的栏目，没人会为此犯难。可事情到了我头上，就不那么简单了。我父亲是高级工程师，属知识份子，但不算成份，成份要查到农村老家，至少要查三代，可我祖上离开原籍已经七代了。我家祖籍皖南，是个大家族。我的七世祖于咸丰年间中举后，举家入蜀为官。那时还没有成份一说，但以土改的标准衡量，恐难逃黑五类之列。到了曾祖父一代，家道中衰。祖父是庶出，光绪年间随生母移居北京外祖父家。看到家业在父亲手中衰败，祖父从小刻苦攻读，立志中兴祖业，终于考入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留校任职，后升任学监，并定居北京。我父亲一辈均在北京出生。民初和北洋时期，祖父从衰败的八旗子弟手中收进不少房产，房租收入颇丰，北京人俗称“吃瓦片”，实现了他中兴祖业的愿望。然而，建国后他被划为房产主，与地主同属剥削阶级，查到这里，就给我定了成份，农村老家成份也就不查了。祖父严守家规，要求子孙后代以皖南为籍贯。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随大学撤到大西南，并在那里定居，我生在四川，后来全家又迁回北京。填籍贯时，我仍写皖南，但每次都要费一番口舌才能解释清楚。

出于“阶级本性”，我当然对血统论十分反感，只是被出身的包袱压着，不敢公开反对而已。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对联成了红卫兵打击反对意见的一根大棒，谁敢对血统论不满，立刻就给你扣一顶“狗崽子”的帽子。他们不仅在教室门内外，黑板两边贴满这付对联，还写了许多小对联贴在学生的课桌上。。我本来对那些以出身好为资本压人一头的学生会和团干部就不满，这回闹的最凶的又是这批

人，我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我出身于儒家学者家庭，从小就从祖父那里接受“为人臣者以忠义为本”的儒家思想，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份子气节为行为准则，视历史上忠勇刚正之士为做人楷模，并天真地把“为天地正气，做古今完人”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另一方面，我在政治上又极为幼稚，对当时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残酷和复杂，以及这付对联的来历背景，一无所知，对与红卫兵对抗的后果毫无思想准备。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从不怀疑“皇天圣明”，即毛泽东的正确，只因为奸臣当道，闭塞圣听，邪恶势力才能利用这付对联逞狂一时。

当我一时热血冲动，决定以自己微弱的声音公开对抗血统论时，根本没考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没想到这种无意义的抗争于红卫兵运动毫发无损，只会是白白去送死。我并不以为自己是忠臣义士，只想到做人要有骨气，准则，要敢于在逆境中坚持正义，不要辱没了自己家族的儒家传统。只想到文天祥《正气歌》中骂贼而死的“颜常山舌，张睢扬齿”（注）。

虽然当时有不少人对血统论不满，但谁也不敢站出来辩论。有的人写了一些诸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之类不疼不痒的对联，但鼓吹血统论的对联占了绝对优势。我草拟了一付对联：

上联：英雄好汉须经革命实践考验
下联：反动浑蛋并非几人能下结论
横批：晚点再说

贴在黑板两侧。这付对联毕竟反映了不少人的观点，一贴出来，马上引起全系甚至外系学生的注意，很多人跑来观看我们班里的对联之战。可以看出，有同感的人不少，只不过不敢流露而已。

正值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挑战，马上就给我以迎头痛击，贴出什么“狗崽子想翻天死路一条，红卫兵挥铁拳迎头痛击”，“左中右早已界限分明，反革命休想混淆视听”之类的对联，并宣布第二天召开全班对联辩论大会。说是辩论大会，但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我，从阶级本性，政治表现，反动言行等方面一一批判。此时，一个知识份子出身的女生站起来发言，说血统论是完全正确的，出身不好就是浑蛋，并承认自己就是浑蛋。她表示，要从浑蛋作起，向红卫兵靠拢，脱胎换骨地改造思想，以走出浑蛋行列，跟著红卫兵永远干革命。最后，她申请加入红卫兵外围组织“红卫队”，并为红卫兵当场批准。显然，这个发言是为了孤立我而预先安排好的。

我万万没想到，世上竟会有这样的奴颜媚骨，以污辱自己的人格向红卫兵求荣取宠。我当时只有二十岁，正值少年气盛，根本没考虑一时冲动会给我带来何等灾难，头脑一热，为这个女生写了一付对联，当场递给她。

屎克螂一压摇头摆尾
跟屁虫紧追半步不差
横批：叭儿狗好

她看完之后立刻站起来说：“当我表示要向红卫兵靠拢时，某某（我的名字）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威胁。这说明凡是我們拥护的敌人就要反对，这更坚定了我的立场。”红卫兵当场发表严正声明，要迎头痛击阶级敌人向革命力量的反扑。此时，在场所有的人都加入了批判我的行列，在泰山压顶般的批判下，我完全失去了反击的能力。

会后，红卫兵宣布要写出系列批判大字报，把我的所有“反革命言行”公布于众，发动全校师生组织批判。第二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全校主要地段，我成了众矢之的，被压的抬不起头来。我不怕强权高压，但是怕孤立，当所有的熟人都躲着我时，我真正地感到自己的弱小。然而，和我在“破四旧”的“红色恐怖”中身心受到的暴力摧残，在运动后期军宣队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时关“牛棚”的人格羞辱比起来，这几张大字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

如今，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大概人对坏事的记忆总会清楚一些，每当回忆起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一幕幕竟如此之清晰，宛如昨天发生一般。时隔三十余年，我依然能回忆起这场对联之战。不过，反思这段经历，也有值得我反省的地方，至少不应该写对联讥讽那位女生，而且用词也过于尖刻。国难当头，每个人都有选择对策的权力，无论是“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还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都不应受到指责。更何况中国自古就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教诲。到我死抱著教条不放，硬要以卵击石，迂腐得有点近于荒唐了。

回首往事，使我感到欣慰的是：面临危难，我敢于坚持信仰，不向强权屈服，没有违背道德良心去随波逐流，保持了自己的人格自尊。

二十年前，我登上位于广西师范学院内的桂林独秀峰，此山从平地兀然拔起，虽不高，却如斧劈刀削，险峻难登。山崖峭壁上，到处是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感叹赞美之词。当我驻步少歇，抬头观望时，一付刻在悬崖上的对联赫然入目：“为天地正气，做古今完人”。我立刻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世上只有独秀峰能当得起这付对联，似我等人间俗子虽可以之自勉，却是永远不可能达到这般境界的。

(注)：颜常山，张睢扬，唐朝节度使，安史之乱为贼所获，坚决不降，痛骂叛贼，被割下舌头，击碎牙齿后，将满口鲜血喷在判贼脸上。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革杂谈

• 启 麦 •

#### ◇ 民族的劫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灾难的十年，梦魇般的纠缠着千千万万受过它洗礼的人。那个时代太奇特了，同年轻人讲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也宁愿它没有真的发生过，然而，历史不仅无法重写，简直也不存在其他可能。

就象在劫难逃一样，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必然会导致一场文革之类的大动乱。正好是在中国社会处于两极分化的年代，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传了进来。成了毛泽东他们夺取政权的王牌武器。面南而王的毛泽东，心境渐呈老态，他固执地认为，他还负有“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天命，而且有人掣肘。他的思想已经定型，知人断事无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暴力革命是其解决阶级冲突的杀手锏。他看见，社会上拿枪的和刚刚放下枪的敌人，已经被他收拾干净，就到党内去寻找“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做他继续革命的对象。

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变了，文化传统却没有变。我们一向不对英雄做任何批判；相信成功者一切都是好的、对的；缺乏独立思考的兴趣……。尧舜的子民，从来

都把出现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王者和圣人身上。共产党告诉我们，毛泽东就是这样“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得来一个的超人。把几千年忠君、自卑的陋习延续了下来。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深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上台之后，不遗余力地以他自己的思想为准，暂时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当他杯弓蛇影、以友为敌地拿刘少奇等人开刀时，毛泽东还投其所好地向他的臣民许诺说，再来一次革命生活会更好；又给了他们一些难得的、发泄积怨的机会。如此，毛泽东没费多大劲，那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自下而上地’开展起来了。”

依照那个时期的行为准则，毛泽东一定会那么干，人民大众也没有理由，不投身到毛的社会革命实验中去。然而，实验失败了，毛不顾而去，一死了之。亿万人民、国家、民族在那前前后后所受的创伤，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平复。

我们虽然缺少先见之明，却善于痛定思痛。若是没有十年文革惨痛的教训，今天恐怕还不会这么彻底地唾弃个人崇拜的愚行、世界革命的幻想和共产主义的神话；争取自由、民主、繁荣的势头，也不会如此之猛，这也许是浩劫之后的补偿吧。

#### ◇ 我们心中的魔鬼

“文革名人”王力先生曾对采访他的人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却收不了场，是因为：“魔鬼放出去以后，收不回来了。”此话值得玩味。现在看来，魔鬼不是指那场浩劫中最倒霉、被批斗的“牛鬼蛇神”，而是中国文化中间几乎所有的糟粕，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面的谬误。

照文革初期的说法：这是一次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里的彻底革命，要革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四旧”）；代之以全新的一套。表面上看，“四旧”很容易就被扫除殆尽了，拆庙宇、焚旧书、改人伦、换规矩……，真个是天翻地覆。但是同时，对于那些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革命造反之余，无意中还补上了旧的传统文化的一课。

取代“四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简称“四新”）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切都要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人都不能有私心杂念、要按照同一个模式思考、无条件地为党奉献、都过清教徒式的生活……。这一套起初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风行了一阵。但它们与人的本能、本性距离实在太远了，根本不可能长久实行。人们先是勉力克己以从，终觉不如方才温习过的“四旧”贴近人情，便自觉不自觉的阳奉阴违了。从来说一不二的毛泽东，看到“四新”迟迟树立不起来，于是变换花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然而，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只能使人心日益涣散和厌烦。就是这样，原本准备三年收摊的文革，到了毛泽东临死还处在某个“深入持久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残酷对待党内异己……也是“四新”的重要内容，它们之简单、粗野、愚昧、无理，同“四旧”中的盲从、迷信、欺诈、文字狱……合为一股，使得本来说是要摒弃的东西，反而发扬光大了起来。其对中国百姓的打击之狠、压力之重、熏陶之深，人人都有领教。长年公然奉行的结果，是把无数本来单纯善良的人渐渐教坏了。

有人说，八十年代中国走向商业社会以来，世风道德堕落的速度惊人。其实，这个过程是从文化革命中间开始的。只是那时人们初学乍练、半遮半掩。几年之后，轻车熟路了，才决堤似地涌将出来，迎接“改革开放”。

## ◇ 盲人骑瞎马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建党建国的方式方法上，一定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否则毛不会对刘那么大动干戈。但是有一个关键之点，他们共同认可和服从，就是政治挂帅、革命第一。不然，刘少奇不至于对自己的倒台那么无可奈何。只是，毛会活用这个原则，而刘却死于句下。

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名义上退居二线，主导着党的方针大计；国家机器的运行，悉由刘少奇执掌。在共产党的理论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事情办好了，也许能算体现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时却是干扰了党的政治路线。事情做坏了，不一定是给正确的政治路线抹了黑，可能竟是政治的需要呢。是非标准既模糊又矛盾，毛泽东则任其混乱，不予规范。这样才便于他因人、因时、因地做出他所需要的裁决。他知道：到处布下陷阱，而抽掉井盖的绳子只攥在自己一个人手里，才能维持超然的地位。

文革一起，毛泽东就躲到杭州去了。他让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少奇当然不知道自己大势将去，半明不白地指导着这次史无前例的运动。他主持派出了工作组，去领导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此举被毛一把抓住，说他这是压制群众，破坏文革。这事儿，成了刘下台的直接原因。刘少奇自咎其责，他说：“我是四平八稳、求稳怕乱，所以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其实，若是他顺风点火，必然冲击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搞乱了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宁”，也是毛拉刘下马的正当借口。那次党内斗争中的毛泽东，可真是左右逢源、进退有据。刘少奇则气数已尽，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死定了。

毛泽东一贯善于把对手的责任，变成他们的负担，从而使自己的轻松上升为优势。不止一本书里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毛的主张是：不为国民政府抗日，国家是蒋介石的，丢失多少国土都是他的责任。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地盘、壮大力量。此事真假莫辨。但终抗日之期，共产党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倒是实情。

内战爆发了，毛以在野之身、游击之性，还是指东打西、攻城掠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全无抚土安民之念。围困长春，饿死无算，就是一例。国民党不能如此灵活、潇洒，自然减去了一分获胜的把握。

## ◇ 把自己套牢

共产党人的愚忠是很出名的。罗瑞卿，大将军衔、解放军总参谋长、副总理。文革序曲中，被人诬陷、百口莫辩，本想以死表明心迹，却只摔断了腿，红卫兵用箩筐抬着他四处游斗；然后关押多年。释放他的那天，罗让司机先把车子开到天安门去。在车里，他欠起身子，对着毛泽东的挂像、郑重其事地行了个军礼。

在中国，这样的人何止万千？《国语》中间有一段，说晋武公破翼国，诱降栾子，栾子不从，说是：“人生有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几千年来，这等忠臣层出不穷，是为中华文化的一部份。毛泽东于其手下，享有亦师、亦君的双重身份，门徒对之只有逆来顺受的份，何谈一个叛字？

周恩来贵为一国之总理，事毛卑躬屈膝，鞍前马后为他忙乎了几十年。本来快要善终了，不料，文革后期毛还是把“大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他。那时节，周已经绝症缠身、有生之日屈指可数了，其伤心、失望可以想见。即使如此，周也没有半点反戈一击的意思。在一次成败未卜的手术之前，周恩来大声留下遗言：“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那么一个风度优雅的人，竟失态有如此

“投降派”一词，是毛泽东他们以《水浒传》中接受招安的宋江为例，称呼不彻底的革命者的代号。“革命队伍”中人一旦与之有染，即刻名节全毁。中国历史上，范蠡、张良那样舍得功成身退的人太少了。打江山就是为了坐江山；或曰革命革得筋疲力尽，再没有急流勇退的气力。那些共产党人，早年出生入死、晚年忍辱负重，红色中国对他们而言，理想所钟之外，个人的荣辱也全系于此了。不仅“达时”的富贵荣华是党给的，“穷时”企盼的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官复原职，也得仰仗毛泽东和党组织的“光荣正确”。他们爱说的一句话是：“把一切献给党”，这里面就包含着：把自己牢牢套在共产主义战车上，这层意思了。

共产党的惯例：失势时的表现是日后甄别使用的重要依据。对党的作为有任何微词，就等于授人以柄，出头之日远矣。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邓小平虽被打倒，但他屏息忍住，看准时机给毛写效忠信，矢言认打认罚，“永不翻案”。果然算做“经住了考验”。东山再起之后二话不说，就“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 ◇ 曲终人不見

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了，对当时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指挥我们批判这个、打倒那个，弄得我们晕头转向的文革要角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我们至今所知有限。他们的名字和行踪，每天见诸报端，却都一律的装模作样，没人知道其脾气禀性、行为方式。他们就像京剧团里的演员，化好妆才上台，更加吸引人的后台，是不让观众进去的。这出历史剧里，脸孔藏得最深的一位，恐怕得数林彪了。

写林彪的书和文章一直畅销。人们对一件事情兴趣历久不衰的原因，不外两个：诱人且日新月异，或重要却模糊不清。林彪的事儿，显然属于后者。有关他的为人处事的故事，矛盾百出。不像其他人，虽然语焉不详，倒还比较一致。

有人说林彪善于揣测毛泽东的好恶，在军队里大搞政治工作、突出毛泽东思想，受到毛的青睐。又有地方说，林一向不理正事，长年疗养，足迹遍及海南岛到大连。就连他主持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内容都不熟悉。我们先是听说，林是文革功臣，为毛推波助澜，不遗余力。后来又被告知，林要“克己复礼”，反对革命。

显然，林彪是帮过毛泽东的大忙，所以毛才让他当了法定接班人。据说林野心膨胀，要抢班夺权，早坐龙床。力主为自己恢复设置国家主席之职，就是步骤之一。另一种说法也很流行：林既不认真批阅文件，更加厌恶外交和官场礼仪，连决议军国大计的政治局会议都很少出席。就差说他患有自闭症了。

一些作者说林彪非常重视与毛泽东的会见，每次都要先于毛到达，还毕恭毕敬地晃动着“红宝书”迎毛于一旁。大陆上同时发行的另一些书刊却说，林是党内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风毛麟角之一。一次“五·一”节晚会，林不但迟到，还因毛冷淡了他，略坐片刻，即拂袖而去。

林彪的生活习性，也有人“改写”。他的一位秘书说没见到他“怕风、怕光、怕出汗、从来不到户外去活动。”甚至，林最大的罪状：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国的定论，也受到挑战了。已经有人指出，中共中央迄今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林彪指挥了暗杀毛泽东的行动。报刊上还有文章追述1971年9月13日晚上发生的事，那里的暗示很明显：林是被他的妻儿挟持而去的。

纵观中国的历史，人物、事件之谜比比皆是。给历史学家留下大量难题，不是一件好事。让民众了解掌握着他们命运的人，倒是当代政治家的义务。

#### ◇ 法宝原是紧箍咒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需要很多条件。例如：社会发展的恰当阶段、民众思想的朦胧状态、世界政治、军事的危险格局……。同等重要的还有一条，就是一位具有足够号召力的领袖。没有这么一个人，文革也许会分解成一系列小运动，走过比十年长得多的时间。1960年代中期，这样的领袖现成的有一个，他就是早已被全党、后来又被全国人民崇拜了二十几年的毛泽东。

个人崇拜是一种统治权术、是需要。已经有学者论证过，共产党搞这一套，是四十年代初期从延安开始的。当时他们是最有声势的在野党，得树起一面旗帜，团结同志、争取民众，与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分庭抗礼。另外，1921年中共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总书记已经换了五、六任，“一朝天子一朝臣”似的，损失了很多干部，还延迟了壮大和发展。比较而言，毛泽东的各方面才能确实远远胜过他的同志，被认为堪当大任。

他们还知道：跟定一个人，对自己的地位，总比朝秦暮楚有保障些；捧起一个人，就能分上一杯羹。大家有此默契，就分头行动起来。毛的秘书张心如首倡“毛泽东主义”之说。据王明说，毛曾对他讲：“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在活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1943年，刘少奇牵头推毛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并规定“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毛的领袖地位从此确定。论功行赏，毛把第二把交椅指给了刘。

在党外，他们则干脆开展造神运动。陕北的老百姓不知究底，以为毛真的是救星下凡，就唱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来了。毛果不负所托，带领他们得了天下。建国以后要办的事情更多了，为便于号令全国，继续神化毛泽东是顺理成章的事。“有易代，无易民”。看到老百姓只知道“胜者王侯、败者贼”，还是遵从“三纲五常”，毛泽东一定搓着手掌暗笑过：真是天助我也！

共产党既控制着全部宣传机器和舆论渠道，国中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就无从发展独立见解——无法正确了解和判断事情的真相和是非，只能接受设计好和审查过的资讯。此时，党内的默契已经变成了制度，各级官吏把一切荣誉和功劳，统统记在毛泽东名下，毛的话成了解决一切难题、争取更大胜利的法宝，人们无不谨遵不悖。

与“三人成虎”同理，好听的话更容易让人确信不疑。毛泽东毕竟是肉眼凡胎，设想一下吧，一个人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下面百万群众向你山呼万岁到热泪盈眶，只怕神仙下凡也难免陶醉。既然只有毛是唯一正确，他老人家当然不能容忍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另搞一套。毛清楚自己在民间享有的巨大声望，于是，他念动真言咒语，崇拜他的亿万善男信女，就奋不顾身地投进了改变民族命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年中，人人循毛的伟大战略布署亦步亦趋，却个个弄得焦头烂额，并不曾“从胜利走向胜利”。起初人们百思不解，逐渐有人意识到，信奉那些战无不胜的法宝，等于戴上了紧箍咒。尤其可悲的是，当初发放紧箍咒的时候，我们都争先恐后抢着要呢。

#### ◇ 治国五乐章



我看到过一段治国的古语，忘记作者是谁，大意倒还记得：理不足以治，则有法；法不足以治，则有权；权不足以治，则有术；术不足以治，则有势。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套治国的手段，毛泽东和共产党在文革当中，做过最为精彩的表演。

“理”是引领民众的根据。如《礼·乐记》中有：“理发诸外，而民莫不顺承。”之说。它大约相当于道德观念，在各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欧洲的中世纪、殖民时代的道德观念与后来就有很大变化。文革时候中国通行的“理”，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那一套。中共当局依照它，把国家引进了混乱和罪恶的深渊。

“以理服人、兵不血刃”的容易事并不常有，因为人民的自觉程度有限，所以得有法。《尚书·吕刑》中有：“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共产党的“法”就是他们的政策和计划。不称其为法，大概是因其以没有常性和自相矛盾为特点。比如，我们曾经被鼓动，用“大字报、大辩论”等方式，表明各自对文化革命的看法，由此分出谁是“革命派”、谁是“保皇派”。两大派系刚刚分开营垒，毛泽东又叫我们无条件“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还有一个时期，“文攻武卫”和“要文斗、不要武斗”都是对的。如此等等，令人无所适从。久之，我们就以“计划不如变化快”来揶揄它了。他们朝令夕改，则逼出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回应。

用“权”，一言九鼎地压在一切之上，古今中外好像还没有人能比得过毛泽东。仅“接班人”一项：他今天打倒了刘少奇，明天树起了林彪。还没有怎么样，他又酝酿叫邓小平回来接手。以后他曾在王洪文、张春桥、周恩来之间摆来选去，最后敲定了华国锋。偌大个中国，他是家长。下面的人，先是在他的指挥棒下转得头昏脑胀，清醒过来就开始向他学习。就象《荀子·君道》篇里说的：“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于是，官场更加黑暗，民间苦难无已。

毛泽东说是喜欢“百家争鸣”，实则独钟情于法家。法家提倡“术治”，“术”是藏在君王心里暗自运用的，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文革期间毛派出大批干将为他冲锋陷阵，但是行前并无训练，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派出去的人，立功的自有赏赐，一旦给他惹了麻烦，他即弃之不顾，还不许人家把他的布置张扬出去。使后继者无辄可循，只能听从他的摆布。曾经在文革前期红得发紫的王力就是一例。按照毛吩咐的，他在社会上大闹了一阵，突然间被捕下狱，无人理睬地关了很多年。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对他有一个批示：“不准对王力进行提审。”

文革拖到后来，民间已经人困马乏，兴味索然。官方还能组织起“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连串运动，是因为他们多年营造而成的威严仍在。这就是“势”。《增韵》解“势”字说：“气焰也”。这股气焰，被在毛泽东那里学得了政治谋略的人，为在运动中捞资本、泄私愤，努力维持着。他们无理可讲、无法可依、无权可用。但他们知道，只消舞起政治帽子，就能吓得人们噤若寒蝉。一个普通的农村知识青年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时候说：考数理化，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现象的回潮。于是，全国高校联考一概作废，重新按照政治条件遴选大学生。这类怪事，文革中不在少数，全凭政治气势才能得逞。

“势不足以治”怎么办呢？古人没有说，恐怕只有垮台之一途了。看看如今的大陆，共产党的组织虽然健在，理论却先垮了。他们支吾其辞、破绽百出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释不清，就是明证。

#### ◇ 斯丹达尔说

写《红与黑》的法国人斯丹达尔，讲到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人们做着最残忍的事，却没有残忍的精神。”外人很难相信会有这样的事——难道他们把贵族抓起来，赶尽杀绝，是受下意识支配的吗？这样的事，经过文化大革命的

中国人就可以理解。或许，实行种族歧视时代的美国人，三、四十年代纳粹当国时候的德国人，军国主义为国策期的日本人也有同感。

文革之初的两、三年里，打、砸、抢，武斗，遍及全国，死人无算、公私财物的破坏更是难以统计。人们知道这是一种破坏行为，却又乐此不疲。沉溺其中的，绝大多数是文质彬彬的学生、老实持重的职员和本本份份的工农。他们认真地、有条理、按计划地强迫他们的同事、上司、亲友低头认罪，毁坏珍贵文物、书籍、建筑。面对尸体、碎片和瓦砾，他们欢呼：“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真正借此机会发泄本性中邪恶的人，只是极少数，不具代表性。那种狂暴的行为可谓残忍，他们却做得义正辞严，“有理、有力、有节”；所以其“革命对象和手段”，也能有保持在某种范围和限度之内。

那时，他们以为中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之中。因为毛主席和共产党告诉他们，“国内的阶级敌人控制了我们的经济、文化命脉；国际上的帝修反，已经把我们包围了起来”，要想从危险之中解脱出来，唯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暴力革命。进而，我们还要用类似的手段，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

肩负着这样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决意破坏的心虽然坚定，却不残忍。就象生活在蛮荒之地的原始人，为饥饿所驱，放火烧山，他们不认为那是“破坏植被”，只道是火种刀耕。亿万群众坦然地做着残忍的勾当，能不令人后怕？

然而，纵观世界史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都是从愚昧无知、幼稚可笑，逐步成长为理智而又成熟的。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有谁能够不犯错误、从不荒唐，理性而又温和地建成高度文明的。错事人人做过、代价皆足痛惜。认真反思我们的过去，为的是“冤有头、债有主”，“不迁怒、不贰过”。与他国比较也是为了重拾信心，不自卑。

#### ◇ 时也运也命也

开展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等人来讲，路线分歧也好、权力之争也罢，总之有其绝大的需要。“七亿神州”齐声响应为的是哪桩呢？说毛会念驱神赶鬼的真言咒语，催眠了我们，只是比喻。他投其所好、给我们机会做向往以久的事情，倒近实情。

那个时候，广大工人、职员、技术人员的生活，都很困难，仅够温饱。农民则大多还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但是，号称以埋葬封建主义为己任的中共上层，却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社会上贫富差距虽不很大，用公家的轿车接送念寄宿制学校的子女，已经显得很刺眼了。党内新贵普遍染上的“官场病”，也与民间尚未退烧的革命热情，格格不入。文化舞台上，劳动人民的形像虽然已经升堂入室，还是要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平分秋色，像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讽刺。

钱锺书先生早就说过：“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就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这样的道理，对老百姓来说是太深奥了一点。我们哪里懂得，人为理想的付出是有限的，一群人更是如此。群体中，意志薄弱的革命者，激情先行消退，他们追求享乐的行为，对周围起着很大的感染作用。因为人的本性中，懒惰和私欲占了不小的比重。进了城的老红军和土八路，先是“到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打了个滚”，发现柔软而有弹性，比老家的土炕和行军路上的“草毯泥毡”舒服得多。封、资、修的玩艺儿，还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魅力所至，难以抵挡。共产党内于是就同气相求般地产生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为了革命的需要”，也从延安的土窑洞搬进了乾隆的“丰泽园”。他倒是还有更高的追求：只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不够，还得改造人民的思想和中国文化。他哪能容忍刘少奇等，把持着中上层大部份权力的修正主义者，势将把中国带回到1949年以前去的做法？但要把他们一一撤换下来，单靠行政命令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的人数太多了。比如皇城所在的北京市，就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想要扳倒他们，非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可。

毛当然知道，对上层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老百姓早就啧有烦言。现在，他只消振臂一呼：再不起来造反、夺他们的权，则眼下这样的日子都快保不住了！全国人民哪有不揭竿而起的道理？毛泽东并没有过高地估计他事业面临的危机；人民大众也自有正当的怨愤、恐惧和要求。只是时不我予，历史的主宰另有安排。毛泽东的直觉，已经被邓小平超质、超量地证实了；我们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落在了一群更加无耻的贪官污吏手里。

#### ◇ 送子观音

共产主义刚刚传来中国的时候，只是“百家”之一。中共一掌权，它就成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到了文革，俨然近似宗教了——组织本是现成的，教条、教规、仪式也都齐全。毛泽东是那个超自然的神，他的学说就是“经”。

对于宗教，以佛教为例，有人把它作为哲学来研究，用批评和分析的方法，“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据说，他们才是真的有信仰，比如禅宗的一些高僧。其余只会磕头烧香，祈求观音菩萨送来大胖小子的芸芸众生，并不懂得教理教义，他们那是迷信。所以，若共产主义真是宗教，我们也算不得信徒，我们是迷信。

那时候，到学校食堂买饭，先要站在毛泽东的画像前面，唱赞歌、念颂辞、鞠躬如仪一番，才能去排队。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暴露活思想”等等日常功课。每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百万文革大军”，看到他影子的人，无不欢呼雀跃、涕泪滂沱。若是谁人有幸同毛握过手，他会几天不洗手地向闻风而来、同他握手的人，传播毛的“仙气儿”。毛泽东贿赂“工人宣传队”的芒果，没人舍得吃，做成标本，供了起来……。虔诚的程度，堪与任何迷信的人群媲美。

我们曾说自己是共产主义的信徒，等于是皈依了“共产教”。佛经《俱舍论》说：“如是皈依，以何为义？救济为义。由彼为依，能永解脱一切苦故。”可见，迷信的本意是依赖。一直以来，我们的生活太苦了，又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人的天性中本有攀附强人、神力的愿望……。于是，我们很容易就迷信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

迷信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狂热，狂热的程度由依赖的缓急而定。我们的懒惰，也许是孔夫子的遗传。他老人家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真理本应自己去追求，他想一劳永逸地得到，却宁死也要等别人传授。这样的话不断地翻版，到了文革，就变成“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呓语。

狂热也有弱点，它不能持久，因为它肤浅。就信仰与迷信而言，我们见到百折不回、日久弥新的，才称之为信仰；那一触即溃、暮四朝三的，就是迷信了。正相当于心理学所说的：“爱情和迷恋，首先在深度上是不同的。”俄国作家莱蒙托夫的一段话，也是这个意思：“没有一条河流能奔腾而无溅沫地，一直流向海洋。而平静往往是潜藏起来的力量的标志。”

所愿不遂，迷信就破灭了。但是需求还在，取巧、依赖的心理没有变，另一种迷信很快就开始了。文革结束时的“信仰危机”，只是对共产主义而言。其它神奇的东西又应运而生了，飞碟、特异功能……，生生不息。

#### ◇ 人多手杂盖塌了房

文革一向是被称做群众运动的。这场毛泽东说它“天然合理”的运动，开始不久，就乱成了一团。这事儿毛并不曾回避，还举了例：“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但他不愧是个“会说巧话”的人。话锋一转，毛又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敌人是谁？如果指刘少奇、邓小平一夥，文革实际上是“乱了群众，锻炼了敌人”。敌人虽然受过冲击，却早得到加倍补偿。那场浩劫留下的恶果，则伴随着民众，度过他们的每一天。

翻翻历史，这种群众运动，简直就是中国的特产。古代无数次农民起义，近代太平天国、义和团、公车上书、“三·一八”、“二·七”等等，哪一次给人民群众带来好处了？倒是那些事件里面，群众自发的成份比较高。中共执政之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四清、文革等，其实都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地”运动起来的，而是假群众之名的授意之作。应当称做“有群众参加的运动”，或是如人们戏言之的“运动群众”。

后来的“四·五”、“六·四”民运，虽然原发民间，却都被上层利用，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筹码和口实。到头来，人民群众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吃了不少苦头。无论是“群众运动”、还是“有群众参加的运动”，都有混乱的特点。在中国这个人口多到“放屁添风、挥涕增河”程度的地方，运动来了，什么样的鬼主意都可以乘乱为之。群众运动有着组织不良，鱼目混杂；缺口甚多，易于渗透；目的性差，可随意误导；人员太多，无法协调等等先天不足，极易被心术不正的人利用。文革之初，“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就因为少数坏人混进来，趁火打劫，才变成了“打、砸、抢”，连累了单纯、天真的早期造反派。后来的一连串运动，被顺势泄私愤、图报复的居心叵测之辈搅和，灾情成倍扩大。“四·五”和“六·四”两次民运，也因为无法控制，才同时也成了一些人浑水摸鱼的场所，给当局提供了暴力镇压的借口。这些都非群众运动的初衷，却又都是这种形式的运动不可避免的弊病。

“群众运动”不论结果多么糟糕，责任都不在人民群众，责任全都应当记在中共当局账上。只因生活艰难、政治专制，民声、民怨无人听取，无从发泄。积攒着，等待某个能够说话、可能采取行动的时机。如此，机会一来怎能不八仙过海似地无所不用其极呢？这也是“逼上梁山”。若是政治清明、言论自由、生活无虞，谁肯冒死搅局？

如此说来，群众运动不甚可取，舍此又没有表达意愿的途径，那要如何是好呢？我不知道。我想，大概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非理性的、跌跌撞撞的；那些成功的取得，大都出乎意料、进步有限、不尽人意的吧。

#### ◇ 人以群分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社会组织和社会进步”一章中道：“中国的人口是由许多自治的小单位构成的，……这些或大或小的单位是以家庭、行业、和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的。个人由这些共同的关系与各自团体发生联系。因此，团体内各分子的关系，比对广大的社会更为密切。”这种小单位至今可见。承平时期，小单位间的关系以合作、互利为主；动乱一来，就往往组合成大单位，相互厮杀。历史上，远的如春秋诸侯、战国七雄和汉末的三国鼎立等。近的就是文革期间的“派性”和“打派仗”了。分野是各派不同的政治见解。

那时候的人，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对如何开展这个运动却各有高见。因

为中共中央、毛泽东下达的指示、政策莫衷一是，下面的人只好自己揣摩、断章取义。譬如，运动之初，有人主张在各级党委带领下进行，因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另一些人则说，既然“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不“踢开党委闹革命”呢？何为“革命干部”、何为“走资派”，也无一定之规；如此等等。很快，各地区、各单位的群众，就分开了营垒，大致可称为“造反派”和“保皇派”。也就是毛所说的“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两边以“战斗队”、“纵队”、“兵团”为单位互相攻击。起初是口舌相向、笔墨为兵，不久就拳脚交加、血拼肉搏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则坐山观虎斗，根据一时的取舍，拉一派、打一派。逼得不知底里的“两派革命群众”，一起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分头造枪铸炮、抢军械库，修工事、挖战壕，你攻我守地越闹越大。

后来的“大联合”徒具形式，双方的是非对错一直是一笔糊涂账。武斗期间，参与者及其亲友、同仁，都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精神折磨和肉体伤害，与对方结下不解之仇。两派间的恩怨，在文革中、晚期主导着各个单位、地区，历次“政治战役”打击目标和保护对象的选择。直到今天，大陆各级官场、尤其是上层，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派性”色彩。今天，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冷漠、猜忌和敌意，也与文革中的“派性”，有着相当程度的因果关系。

为什么一分“派”就不共戴天呢？我想，大概与国人“择善固执”的民族性有关。朱熹注《中庸章句》“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他说“诚之者”，是圣人以外的凡人。“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而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

自古以来，百姓都是被统治者当做愚民施教化的。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的圣人是毛泽东，他的理论被奉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真理，就是那时候的“善”。而他的一套本是大杂烩，国中的善男信女，虔心体验已经各有会意，又如朱子所言：“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正好毛的学说，上至国防、科技，下到“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无所不备，自然要为不同利益团体和个人各取所需。

在中国，谁都懂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所以，“择善”就有了双重意义：“主义”的敲定，只解决了政治倾向；“人欲之私”还得依靠集体之力才能满足。双方都“固执”地追求这样的“善”，还有不演成“全面内战”的道理？可惜，“用沟通、理解、谈判等方式化解矛盾和冲突”，是八十年代以后才时兴起来的。

#### ◇ 经风雨见世面

文革中间，毛泽东大整他的干部队伍，是要解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排在前面的几代，长年在“革命大熔炉中陶冶”，无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那时少不更事的第四代接班人，却无情地嘲笑了毛的“高瞻远瞩”。他们本是共产革命家的嫡传，官方称呼是“干部子弟”。

中国本来就有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朝代的更迭，只换名姓而已。文革前，红朝新贵的子女已经在社会上趾高气昂了。他们的做派被称为“优越感”，显见得享有某些特权，是一般民众羡慕和嫉妒的对象。其实，真正享受得到特权的只有上层那一部份叫做“高干子弟”的人，但是他们特有的习气，不同程度地感染了几乎全部干部子弟。因为，青少年有自己的行为标准，无论什么时代，桀傲不驯、离经叛

道者都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榜样。

文革肇始，领头造反的中学红卫兵就是这些干部子弟。然而，红卫兵起过“先锋和桥梁作用”之后就“犯错误”了，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学校正在“停课闹革命”，家长大都陷在各机关的运动里，自顾不暇。无人管束的中学生，性格中顽劣的一面就象病毒逃脱了试管、又掉进牛肉汤，一下就成了气候，为非作歹起来。抽烟、喝酒自不消说；几十个人结伙去打群架，也不需要多么大的胆略；成熟得早一点的，已经会动女生的脑筋了；还有人学会了溜门撬锁、偷钱包的活计。唯有文化知识一点也没学，自己起了个称号也是不伦不类：玩主。

本来，按照中共的规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有一堂必修课，叫做“经风雨、见世面”。红卫兵先经历了阶级斗争腥风血雨的大场面；颓废以后，就组织了黑社会，浸润在阴风晦雨之中，自己变成了社会的阴暗面。外面在搞派性、打派仗，玩主们也按自己家庭所属的机关，分帮结伙，在住地四周划出势力范围。各部委子弟帮时分时合，分则械斗、合则啸聚成群去打别人。内部争当老大，也采暴力形式。处处与全国的革命形势保持一致。不同的是，外面在抓“走资派”，“走资派”的子女在机关大院素有攀比之风的玩主中间仍然受到尊敬。父亲的官越大，在玩主帮里越容易当头。现在人们常说的“太子党”，就是这些人中的最高层。

一来二去，文革结束了，玩主们正好长大成人，早不满足调皮捣蛋的勾当，萌发参政意识了。他们看不起过了气的革命前辈——“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上面也持“雏凤清于老风声”之说，于是做出决议：“一家出一个副部级”！高干子弟就正式接班了。干部子弟不但义不容辞的接了班，还扬长避短先富了起来——他们比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还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去攫取财富。

小的时候，我们总听老师说，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这个话，在文革中引用得更频繁了。为了“永葆革命江山万年红”，从中央到地方可没少下功夫。可是，最后破产的不是“杜勒斯的无耻谰言”，而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千秋大计”。依文革“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标准，如今中国的状况，足够把毛老爷子气得吐血了。“老杜”若是地下有知，心里该多得意呀。

□ 一九九八年一月 于维吉尼亚

~~~~~  
【研究报告】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

• 宋永毅 •

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九月，正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伴随老红卫兵皮带的呼啸声在社会上风行一时，红色恐怖下的人们连乘车、上医院都不得被迫报上自己的成份（即家庭出身）之际，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北京学徒工却对此既不以为然又忧心忡忡，为了向社会公开他的独立思考和向血统论发起正面挑战，他开始伏案潜心写作一篇名叫《出身论》的文章。他，就是遇罗克。

《出身论》初稿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开始只是几百份油印的传单。它们产生于遇罗克菲薄的学徒工每月二十元左右的薪水，是他用自己的工资买来钢板、蜡纸刻印而成。并由他弟弟遇罗文等帮忙张贴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及电线杆上的。遇罗克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在回答别人这一笔名缘起时他说：“我不喜欢什么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万个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

在一九六六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中，北京男四中学生牟志京“于极偶然中”在一根电线杆上看到最初的《出身论》油印件，署名是‘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读过之后，牟志京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他自己反对‘对联’的血统论，还只是出于天性和直觉，而《出身论》的作者则广征博引，条分缕析，颇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牟志京当即便按照油印文章上所附联系人地址，赶到六十五中。在那里他遇到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参看本刊 z k 9 6 1 0 c：《从知识者的良心出发——访牟志京博士》一文）。

经商量后，他们决定把《出身论》变成铅印，广为散发。牟志京便向四中借了五百元钱，去解放军 1 2 0 1 印刷厂联系印刷。经牟志京、遇罗克修改后的《出身论》共有三万多字，在排版成一个对开四版的传单时竟空出了一大块，于是牟志京灵机一动，干脆取名《中学文革报》，主办单位的名称起了个更响亮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国文革中第一份纯民间背景的报纸便如此诞生了。《出身论》如一声惊雷，炸开了当时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第一期三万份报纸竟在数天内一售而空。很快又出专刊六万份，正是一纸风行，京城纸贵。人民群众还自发地将它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广为散发。这一情景，与血统论的代表作《谭力夫讲话》是由中共的各级省市县委下令广为印发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正好从中窥见民心向背。《中学文革报》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近万封全国除台湾和西藏外所有省市的群众来信，坚决支持《出身论》。《中学文革报》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创刊，至四月因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共出版了六期。遇罗克在上面共发表了六篇论文：

- 1.出身论（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 2.谈“纯”（第二期，1967年2月2日）
- 3.“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第三期，1967年2月10日）
- 4.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第四期，1967年2月21日）
- 5.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第五期，1967年3月6日）
- 6.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第六期，1967年4月1日）

此外，他还有一篇《谈鸿沟》，发表在首都《中学论坛》的创刊号（1967年2月27日）上。这些论文构成了《出身论》的人权主义体系，又很快形成了一股为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思潮，自然也遭到血统论维护者“联动”等的反对。他们不断冲击辩论会场，抢砸报纸编辑部……毛泽东的追随者们从林彪、陈伯达到戚本禹之流都在他们当时的讲话中或正面或侧面地批判过《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大方向错了”，“有人利用出身问题挑拨我们党与广大青年群众的关系”。由此可见，《出身论》触动的不仅是十七年中共旧体制的维护者们的利益，它动摇的是包括文革派在内的整个中共的思想体系。它自然而然地成了统治者们要合力绞杀的异端邪说了。

即便对《出身论》只投去匆匆一瞥，也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观点是二个字：“平等”——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出身论》）。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统治者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这样，中共当局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对象——成份与出身不好的人的险恶用

心便昭示于天下了。由于《出身论》是在与血统论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对血统论的鼓吹者——那批狂热的大多为干部子弟的老红卫兵批判，必然使遇罗克的笔锋涉及到反特权这一敏感课题。从而使《出身论》等文章成了最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和批判中共党内特权阶层的文章。在遇罗克看来：十七年的官僚体制使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并指出血统论完全是中共当局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谈鸿沟》）。

这样的思想在文革初期的中国真可谓惊世骇俗，而它又非常接近现代民主主义的人权思想。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遇罗克的《出身论》完全无愧为一份黑暗王国中耀眼的人权宣言书，而年仅二十余岁的遇罗克为此祭上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如同后文革时期（1976—1982）的民主运动的思想家们在评论《出身论》时指出：“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可以前进得很远，可是作者当时还不能明确地与官僚势力对立，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现存制度‘无比优越性’的肯定，对党及其领袖缺乏具体分析。显然《出身论》只能是六十年代的产物，若作者本人今日尚在也不会满意的”。

这一批评说对了一半，即“作者当时还不能明确地与官僚主义势力对立”。至于说作者“对现存制度‘无比优越性’的肯定”，恐怕更多的是遇罗克行文时的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至于他大量引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语录，在更切近实际的意义上，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和当时流行的“打著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而已。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他从一开始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决反对者。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遇罗克写了《论“清”官非“官”》（一万六千多字）《人们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万五千余字）和《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一万四千字）等论文投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文汇报》等，对姚文元进行全面反驳。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稿件自然遭到了退稿。遇罗克在收到陈伯达把持的《红旗》杂志退稿后在当天日记中嘲笑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这篇文章里，他点名批判了姚文元的谬论。他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降临，我们整个民族的行为与思想都陷入混乱之际，遇罗克却自始至终保持著清醒。他首先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966年2月6日的日记中，他就批判了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语言来吹捧毛泽东。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遇罗克还一眼看穿所谓文化大革命幕后的权力斗争实质，他在6月6日日记中针对狂热的民众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他尤其反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煽动青少年斗老师、破四旧等反文化的野蛮行为。他在6月17

日日记中写道：“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老师自杀了，小学生行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象新市委所认为：‘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8月23日他又写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门面牌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好一个焚书坑儒”。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对十七年官僚体制的冲击，遇罗克持冷静分析的态度。一方面他肯定人民对官僚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他又批判这种冲击的巨大历史局限性和为毛泽东等人的利用性。在8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志鑫的大会……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但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

如同王希哲后来所评论的，遇罗克的目光鞭辟入里地看到了反官僚的群众运动背后的危机：“群众批斗干部，是因为干部的官僚化与群众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官僚化并不完全是干部个人的作风，它正是在毛泽东专制主义体制下人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结果。但是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给干部罗列的‘罪状’首要的恰恰是，因为干部们反对了毛泽东（这真是冤枉）！这证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人民反官僚主义的利益还从属于毛泽东发展专制主义的利益，人民群众本能的反官僚制度的要求却被毛泽东披上了为国家更加专制独裁而战的战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是林彪提出来的，谁高喊了它呢？是人民，但这根棍子最后把谁打痛了呢？还是人民！”

遇罗克之所以能“举世皆浊我独清”，和他在1960年因出身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有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从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学到卢梭的人权平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都下过苦功夫钻研。这些都培养了他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已变成现代迷信的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据《中学文革报》的实际主编牟志京回忆：“遇罗克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虽也有许多赞赏之处，但也同时有许多批评之处”。

据与遇罗克一起坐过牢的张朗朗回忆，遇罗克在研究了《毛泽东选集》新旧版的修改后，露出他“习惯地嘲讽的笑容”，继而对张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虽然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它的变异毛泽东思想不免是历史的嘲讽，但这又是中国青年一代在觉醒途中的一个必由的历史阶梯。然而，疯狂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如同遇罗克当年的伙伴们在回首当年时所言：“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为此，《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但遇罗克仍坚强不屈，五次上书反驳毛泽东的追随者们。1967年下半年，他又转而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准备撰写《工资论》，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贡献发给。同时遇罗克估计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在1967年的总结中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著风浪前进……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以“企图暗杀毛主席”

的完全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于1970年3月5日。那一年，他才27岁。人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出身论》揭露了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现代种姓制度的本质而惨遭杀害。三十年岁月并没有尘封住《出身论》的光华，今天重读遇罗克的一系列论著，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在温和的言语后对“平等”的竭诚追求与现代人权思想的熠熠光辉。

参考文献：

- ①遇罗锦《我的哥哥遇罗克》，北京：《四五论坛》第13期，1979年10月7日。
- ②谷丁《一个人的“文革史”话牟志京》（上），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1992年2月19日。
- ③石桦生《一份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文献——评遇罗克同志的〈出身论〉》，北京：《四五论坛》第13期，1979年10月7日。
- ④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北京：《光明日报》，1980年9月21日—22日。
- ⑤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香港：《时代》，1981年2月。
- ⑥引自牟志京在哈佛大学“文革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1996年5月11日）。
- ⑦张朗朗《我与遇罗克在狱中》，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7月。
- ⑧陶洛诵《留在世界的尽头》，悉尼：好友印刷公司，1992年。

□ 转载自《中国之春》1997年第6期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肖十一（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张雨田（美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荣刚（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波（美国）	<cnd-cm@cnd.org>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